

# 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与妇女发展

文/王小璐 王晓焘 唐美玲

【摘要】本研究力图探讨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与妇女发展尤其是职业和家庭领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虽然促进了妇女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妇女职业发展的不均衡加剧，进而嵌入家庭领域强化为妇女的自我角色认知和行为选择。

【关键词】社会转型；妇女；职业发展；家庭角色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社会转型期的青年过渡：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CX09B\_007R。

【作者简介】王小璐、王晓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唐美玲，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 一、转型期妇女的职业发展

吉登斯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关注的是现代性及其后果。从社会学理论传统可知，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至少经历三个维度的转变，即经济上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从克里斯玛型统治向法理性和理性化统治转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身份依赖关系向民主自由转变。用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概括的话，现代化具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特征。从这样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关注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中妇女的职业发展，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维度与“个人自由”维度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两者关系的考察必须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背景框架下进行。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大量的特殊性，这在孙立平等学者所提出的转型社会学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述。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包含了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同时在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变迁逐渐定型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断裂”现象。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我们所关注的妇女的“市场经济”维度和“个人自由”维度都应该在中国本土的语境里加以理解和阐释。

### （一）妇女自身的职业发展状况

如果单从妇女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女性就业人数来看，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持续上升的。以江

苏省妇女职业发展为例，尽管国有单位和集体城镇单位的女性就业人数有下降趋势，但单位女职工总数在2001年到2004年间基本稳定在230万到240万之间，而2005年之后单位女职工总数量逐年增多，每年的平均增幅在20万人左右，应该说江苏妇女的就业状况较好。

但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却显示女性就业难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百度搜索“女性就业难”为关键词，即可发现女性就业难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热点问题受关注度较高，并且每年仍以较大幅度上升。从数量上来看，2007年的相关新闻数目已经是2003年的10倍以上。

如何理解女性职工人数不断增长和女性就业问题之间不断凸现的矛盾呢？也许我们应该跳出纵向的妇女职业发展的比较视野，转而从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以及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劳动这两个视角寻找答案。

### （二）妇女相对于男性的职业发展状况

我们将作为妇女职业发展比较的天然参照群体男性的职业发展引入时，发现同期相比女性在职的弱势相当明显。2001年至2007年江苏男性职工人数，与同期女职工人数变化相比，始终保持在350万至400万人的优势区间，而女性在职职工人数最多时也不过300万人左右。

这表明尽管妇女在就职人数上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只是一种对妇女职业发展的纵向比

较结果。如果我们进一步回溯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女性在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就职比例就会发现，1978年女性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是33%，以后逐年增长，1994年达到最高点39%，1994年之后此比例即停滞不前。女性下岗职工增加，在自1993年开始的国有企业调整所涌现出的下岗大军中，女性占总人数的60%以上，且下岗女性再就业难度更大。而在体制外增加的就业机会里，男女两性也呈现出不平等的、行业区隔的发展趋势，即女性就业模式中的非正规就业、阶段性就业增多，且就业结构也集中在技术要求含量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男女两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9年的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比1989年增长了7.4个百分点，导致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经济支柱功能受到影响。另外，尽管经济运行方式转变带来的是职业发展的契机，但女性即使是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女性在职业升迁中也存在“玻璃天花板”效应。笔者在—项关于青年白领职业获得和职业流动的调查中发现，在刚开始就业的3年之内，青年白领女性和男性在职位升迁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工作后的3~5年里，青年白领男性成为管理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青年白领女性，两者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总之，与同期男性相比，妇女的就职数量和职业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反而强化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建构。或许正如孙立平指出的，当一个整体的结构被推入到一场马拉松时，一部分人会被完全地甩到结构之外。对于妇女和妇女发展来说，其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占据较弱势的地位，那么在进入到转型的马拉松之后，妇女会越来越被甩到结构之外。

### （三）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劳动

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进行反思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家务劳动。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单就未就业人口而言，全国共有7015953人单纯料理家务，其中男性611169人，占8.7%，而女性高达6404784人，比例高达91.3%。江苏省在该指标上男性比例略高，但是女性仍然占绝对多数。2000年江苏省共有374761人单纯料理家务，其中男性只有55274人，占14.7%，而女性高达319487人，比例达到85.3%。可以看到的是，上面的数据仅仅指单纯从事家务劳动者，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妇女即使外出参加工作，家务劳动一般还是由妇女来承担。可见，女性仍是家务劳动最大的承担者。

但是家务劳动始终没有获得过与职业完全等同

的地位，尽管我们说两者都是社会良性发展所必需的，而且两者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市场和价值的存在及继续强化，所造成的认知是只有在有薪的社会劳动才被认定为具有价值的劳动，家务劳动属于无薪社会劳动的范畴，得不到普遍的价值认可。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妇女的全面发展仍然受到“父权体系”下的权力和结构关系的阻碍。妇女之所以在职业发展上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表面上的原因是性别差异，以及家务劳动的价值始终没有被得到应有的承认，而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不能正视建构社会性别和家务劳动价值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的存在。因此，在当前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的情形下，如何避免产生“市场”决定一切价值的倾向，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给资本主义式的市场一个终结，是妇女职业发展能否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

### 二、转型期妇女的家庭角色变化

关于妇女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主题的研究是妇女家庭领域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其不仅与家庭生活状况、家庭生活方式及家庭问题、婚姻家庭观念等主题息息相关，还是最能体现妇女解放及妇女发展程度的表征，有利于我们把握具体的社会结构特征。因此，本部分将围绕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探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发展和变迁。

妇女在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第一，就其在出生家庭的社会角色而言，她们在教育、职业以及婚恋等方面的选择都更为独立和自主，这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已得到证实。第二，从妇女在生育家庭即结婚后建立的新家庭里的社会角色来看，女性对衡量婚姻质量的某些指标的评价有所下降，两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抽样显示，1990年有80%的妇女认为夫妻沟通时自己受到重视，而2000年的调查中持此观点的妇女下降了11个百分点。第三，妇女群体中出现了生活样态的分流，有相当一部分女性选择重新回归家庭，这其中既包括低收入家庭中的失业妇女，也包括一部分拥有较好职业、较高收入的城市职业女性。

上述这些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嵌入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目前的社会转型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常规社会变迁。它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的转折意义，并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将宏观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反映了我国在转折期的社会生活

逻辑。就职业妇女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对其家庭生活的最大影响在于使她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及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及自身的角色认知发生变迁，从而影响到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

### （一）经济体制转变期社会文化脉络的变迁

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互为建构。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女性在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社会结构凸现出男女分化的趋势，使得社会文化脉络萌发了传统观念的回潮。在此影响下，职业女性所依据的有关家庭职责、权利、义务的角色期望和角色行为规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概括而言，就是社会对职业女性的传统角色保持了继续社会化的惯性，有关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难以突破。媒介仍然把男性的角色定义在工作范围内，而女性局限在家庭范围里。而这种社会文化以及女性的主体认同和参与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现有社会结构里的职业分化。2000年调查显示，男性和女性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比例比1990年分别上升了13和12个百分点。这也就不难解释女性择偶时更注重经济因素，而成家之后却依然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事实。

### （二）经济体制转变期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得到提高，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人口流动更快、就业更广泛，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家庭的分化进程。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1978年之后城市家庭的子女数大幅减少，经济体制转变所带来的住房改革，也为经济收入提升后的住房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我国家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在历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中，平均家庭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2年的4.4人/户下降到2005年的3.13人/户，若单独统计城市则家庭规模将会更小。

家庭规模缩小的同时，家庭结构也日趋简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增多。这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更加独立的家庭生活空间，有利于夫妻之间感情的调试，减少了代际矛盾，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家庭的重心也由孩子转向夫妻。城市工业的产业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城市的家庭功能也出现了变迁，家庭由以生产功能为主向以消费功能为主转变。虽然妇女在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功能上有所弱化，但其在家庭内的地位并不一定降低，她们更多地扮演了家庭消费决策以

及子女教育决策的角色。目前来看，夫妻的关系也由传统的附属关系向伴侣关系转变，且女性对婚姻质量和配偶有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也更能正视婚姻关系的实质并敢于表露，所以虽然女性主观的婚姻满意度较高，但客观衡量评价却与以往相比有所降低。

### （三）经济体制转变期女性角色认知的变迁

以往的文献通常将全体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分析，但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通常意义上的妇女其实是差别迥异的异质群体，年龄、职业、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使得相同社会文化脉络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行为。因此在分析妇女发展时，我们也应该对不同阶层的妇女分化有所认识，并注意到她们之间的差异。

与性别分层相比，妇女内部的分层更值得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单一的体制内就业局面被打破，这一方面为妇女职业发展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就业的压力。2002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失业率上升了13.55%，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女性失业率上升得更为明显，上升了23.23%。与下岗女性的边缘化困境相对的是，一部分受过较高教育的城市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进入了精英阶层。而且，她们在工作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内在价值取代外在价值，就业动机由考虑经济因素转变为关注个人发展，在就业模式上的自主选择也有所增强，自由职业者及自我雇佣者数量增多，且经济状况良好。因此，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妇女回家”现象而言，既是因下岗集资就业而“二保一”的无奈之举，也有为享受生活而离职的自愿选择。

### 三、结论和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妇女尤其是城市青年妇女在职业领域和家庭领域内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是“后退”的趋势。如何认识这些特征和问题，仅仅依靠性别分析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置于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内思考。

首先，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妇女发展的正向性和单向性。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与妇女群体的良性发展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必然成立。可以说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政治的不

断进步、个体（包括妇女）的全面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不适应。目前我国妇女在职业和家庭领域内出现的问题、冲突，以及传统角色定位的回潮主要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非线性。而且随着过程的具体发展，可能还会出现许多复杂的、不一致的变化，甚至是逆转，这一过程中外来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其次，经济运行方式同时作用于妇女在职业和家庭领域内的发展，且这两者的程度具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妇女的职业发展而言，经济体制的转变造成妇女职业发展的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就业率下降及多层分化的出现与经济体制转型的三个背景因素有关。其一，我国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第三产业随之得到发展，而女性在第三产业的就业劣势使其丧失了新的劳动增长机会，就业率相对下降。其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政府对女性的照顾政策使得男性就业者和女性就业者之间，以及不同层次的女性就业者之间的劳动机会和劳动资源分配较为平均，而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分配打破了这种平均，使得机会和资源向男性就业者以及女性就业者中的强势群体转移和集中。其三，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只能分享低端的劳动力市场，而廉价的女性劳动者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逐步被边缘化，在非制度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就妇女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而言，职业发展的不均衡嵌入其中。对于妇女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家庭之外的有偿工作，但因为这些工作仍处于男性控制的宏观社会领域内，使得她们的经济权利打了折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妇女参加工作并为家庭经济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在家庭领域内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利，仍然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再次，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导致男女不平等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存在。职业领域内所呈现出的总体的性别分层，使得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工及各项劳动资源更倾向于男性就业者，并使得他们在家庭内外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权利优势。这种优势所凸现的性别偏见一旦在家庭生活内得到印证，便会强化女性的性别意识，并塑造出与之相应的性别规范，使得女性容易自发地接受带有偏向性的家庭角色定位。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大众传播媒介、同辈群体以及城市职业女性个体的年龄、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尽管当前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家庭地位表现出提升的态势，但并不能就此认

为女性地位或者说家庭地位得到了提高而男性的家庭地位受到削弱，也不能说男女两性取得了平等。因为建立在社会性别基础上的劳动分工，使得男性更多表现为经济价值取向，而女性更多为情感价值取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在男性意识形态角色不受威胁的条件下以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为代价获取的。事实上的两性不平等仍然在家庭以及更广泛的范畴内，以更为隐蔽的诸如家庭策略之类的形式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囿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未能在妇女内部分层、地区差异的横向比较以及妇女发展的历时性分析中做进一步展开，这也是日后妇女研究及妇女工作值得注意的地方。

#### 参考文献

- [1]彭希哲，王禄宁，何圣.运用妇女发展指标推动妇女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04,(6).
-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3]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4]唐美玲.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男性与女性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07,(12).
- [5]田晓虹.转型期择偶模式的实态与变化[J].浙江学刊,2001(1).
- [6]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6).
- [7]谭琳.1995~2005：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8]贺雪飞.广告中男性形象的潜台词[J].粤海风，2003,(1).
- [9]丁赛.中国城市已婚女性就业及其对家庭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D].2004.
- [10]唐美玲.青年白领的家庭角色与工作价值取向的关系分析——对山东·青岛青年白领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调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 [1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责任编辑：路辉)